

丁福保之藏書及其古籍整理之成就

Ding Fubao's Collection and His Achievement in Managing Old Rare Books

趙飛鵬 Chao Fei-pang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mail: fpchao@ntu.edu.tw

【摘要 Abstract】

丁福保是近代中國重要的文獻學家、藏書家、佛學家，也是一位醫師，兼通中西醫學，開業行醫兼出版醫學書籍、發行報刊，對於民國初年醫學知識的普及，有很大影響。而丁氏對近代傳統學術研究最大的貢獻，則是主持編纂了許多部文獻資料集成圖書，且大多為前此從未有人從事過的發揮創意之舉，對後人啟迪、影響甚大。本文將析論丁氏之藏書經過，並從金石文字、詩歌文獻及佛教典籍三方面，探討其編纂整理古籍文獻之理念及成就。

Ding Fubao is an important figure as a bibliographer, a private book collector, a Buddhist, and, a doctor as well. He was knowledgeable in both western medicine and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He practiced medicine on the one hand and engaged in publishing medical books and newspaper on the other, therefore, was instrumental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medical knowledge. However, the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 by Dr. Ding was his compilation of many important primary collections. His compilation works greatly benefit the study and researches of Chinese classics. His approaches were mostly innovative for his time, and quite inspirational to us. The author tried to depict how Dr. Ding built up his own library, then taking examples

from epigraph, lyrics and poems, and Buddhist Sutra to discuss about Dr. Ding's idea and achievement in management of old books.

【關鍵詞 Keywords】

丁福保、藏書家、文獻學家、近代學人、古籍整理

Ding Fubao; Private Book Collector; Bibliographer; Contemporary Scholars; Rare Books Management

一、前言

近幾年來，「變動時期」的學術與思想文化，逐漸成為國內文史學界研究探討的熱點，先後已舉辦許多有關的學術研討會。例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已執行多年的「變動時期的經學（1912-1949）研究計畫」，迄今已舉行過八次以上的小型研討會。又如中正大學中文系主辦的「近世意象與文化轉型國際學術研討會」（2012年11月29日至11月30日），目的也在「勾勒出『文化轉型』的圖譜」；再如中央大學文學院主辦的「明清鼎革變動與文化詮釋工作坊研討會」（2012年3月16日），是「鑑於歷來學界對於明清歷史的變動，多集中在政治層面的探討，故希望擴及到社會、文化、文學等各層面的討論。」可知無論是明、清之際的鼎革變化，或是清末、民國的中西交會，不僅在當時影響巨大，更成為當代學界關注的焦點。

在「變動時期」的學術與思想文化之中，知識分子責無旁貸的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往往影響了當時與後世。以清末民初而言，除了人所熟知的蔡元培（1868-1940）、章太炎（1869-1936）、梁啟超（1873-1929）、熊十力（1885-1968）、胡適（1891-1962）、顧頡剛（1893-1980）、傅斯年（1896-1950）……等知名度甚高的知識分子之外，其實還有許許多多貢獻深遠，其影響甚至一直到達現代，但是並未引起太多關注的知識分子，有待進一步分析、探討，為我人理解此一時期的歷史文化意義，提供更廣闊的視野。據筆者觀察，丁福保居士正是這樣一位知名度並沒有上述幾位那麼高，但是其影響力實值得深入研究的知識分子。

丁福保（1874-1952）字仲祐，號疇隱居士，一號濟陽破衲。江蘇無錫人，近代藏書家、文獻學家、佛學家。光緒二十一年（1895）肄業于江陰南菁書院，見院中

藏書甚富，乃手抄書目一冊，發願他日處境稍裕，必按目盡購之。次年考取秀才，因不喜時文，自此絕意科場，致力於研究學術。並開始隨華蘅芳（若汀，1833-1902）習數學，編撰《算學書目提要》，1900年刊行。又鑒於身體多病，隨名醫趙元益（靜涵，1840-1912）習醫學，其後創辦丁氏醫院、醫學書局，先後編譯出版了近八十種國內外醫學書籍，合稱《丁氏醫學叢書》。光緒二十七年，入東文學堂學習日文，成為日後吸收日本學術成果之基礎。光緒二十九年（1903），受張之洞（1837-1909）之聘入京，任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譯學館算學兼生理衛生學教習。光緒三十一年（1905），從其友人余梅生處，借讀《釋氏語錄》，逐錄其中警句，以為座右銘，此為丁氏接觸佛書之始；又因早年曾結識近代佛學復興者楊文會居士（仁山），對其以後深入佛學研究亦有相當影響。宣統元年（1909），奉政府之命赴日本考察醫學，次年於上海創辦「中西醫學研究會」。入民國後，全家遷居上海。民國5年（1916），曾大病幾死，民國9年（1920），其母薛太夫人病逝，自此戒葷茹素，虔誠信佛。除行醫、印書、捐書外，並廣購佛學書籍，深入研究。綜計丁氏一生出版與注解之佛經約數十種，均流通於世。民國41年，病逝於上海。

雖然由丁福保所編纂著述的幾部書籍，問世都已將近一個世紀，卻絲毫沒有減損其價值，到目前為止使用的情況仍然相當普遍。如《古錢大辭典》至今仍為研究錢幣學必用之工具書；《說文解字詁林》正、補編，凡是研究文字學或古文字學的學者大概沒有不曾參考利用過的；《佛學大辭典》更是國人所編的第一部佛學辭典，研究佛學者無人不知，被譽為「佛教入門的金剛寶鑽，佛學研究的無言良師」（薩爾吉，2001）的重要工具書。然而對於丁福保本人及其對學術貢獻的研究，卻仍然顯得頗為不足。有鑑於目前國內學術界對丁福保的研究並不多，亟待增補。¹ 本文將回顧其藏書經過，並從金石文字、詩歌文獻及佛教典籍三個方面，探討其古籍整理及編纂之理念與貢獻，以做為理解變動時期知識分子歷史意義的一個新的角度。

¹ 從國家圖書館「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檢索可知，目前與丁福保研究有直接相關的論文只有12篇，其中有5篇是記載其生平事蹟。「臺灣博碩士論文系統」檢索學位論文的結果則是0。

二、藏書事業之建立

丁福保的古籍整理事業，與其豐富的藏書基礎有關。丁氏有志於藏書，開始甚早。其《疇隱居士自訂年譜》光緒二十年（1894）條下云：

許侶樵先生因秋試，延余至廉南湖先生家代館。廉氏藏書頗多，余寢饋其中者數月，自是頗有志藏書，惜無力，不能多購。（丁福保編，2004）

此處說明受到廉南湖² 家藏書甚多的啟發，開始有藏書之志。丁福保任廉氏家教前後兩年多，眼界大開。又二十一年（1895）條下云：

余肄業江陰南菁書院，³ 見院中藏書甚富，如入二酉之岩，適五都之市。可以盪目邀魂，批發吾十年聾瞽，狂喜無已！乃手抄院中藏書目一冊，而私祝曰：「他日果能處境稍裕，必照此目盡購之。」（丁福保編，2004）

當時丁福保年僅 22 歲，即立志廣購圖書，做為治學的起始。此後數十年，不忘初心，努力蒐集購求，最後所得，遠超過當年的預期。

首先，其藏書的原則是：

凡聖人所削、史官所書與夫朝章國典、制度文物，為先王之大經大法、可以考見歷代之所因所革者，以及山經野乘、浮屠神仙、醫學卜筮、種植之書，靡所不收。……他如外國科學、哲學之書，亦擇要購置。（譚暢，2011）

可說是包羅古今中外，無所不藏。到了民國 15 年（1926），他在「自題五十歲小影」詩中說：「藏書十萬又三千，笑傲王侯別有天。」僅其數量之多，即已足以名列大藏書家之林了，五年後（1931）其藏書樓「詒林精舍」落成時，藏書量更已達到 15 萬卷（蘇精，2009）。

其次，丁氏藏書之精勤不倦，亦屢屢見於其《自訂年譜》之記述。如民國 2 年（1913）條下云：

² 廉泉（1868-1932），字惠卿，號南湖居士，無錫名士。光緒二十年（1894）舉人，次年入京會試，參加康有為發動的「公車上書」。後任清廷度支部郎中，暗中支持革命。民國後隱居不仕，於西湖邊建「小萬柳堂」，以藏書及古今書畫知名。其夫人吳芝瑛，為清末著名古文家吳汝倫姪孫女，亦好書畫，與革命烈士秋瑾為摯友。小萬柳堂後售與富商蔣國榜，現位於西湖風景區花港觀魚景區內。

³ 南菁書院位於江陰縣城內，清·光緒九年（1883）由江蘇學政黃體芳（1832-1899）創建，取朱熹〈子遊祠堂記〉中「南方之學，得其菁華」之語而命名。光緒十二年，王先謙於院中講學，並主編《皇清經解續編》。

余性嗜書，昔為衣食所困，無力多購，少時所買者，大抵皆石印本及尋常坊刻本。自移家上海後，乃稍稍從估客購取善本。……凡購買一書，必幾費經營，始克措貲議價，若書值在百元以上者，往往質產鬻田，奔走數十日而始克購成。其得之既甚難，故讀之益勤奮。每有朝得一書，喜極欲狂，讀至深夜尚不忍釋手者。此情此景，余時時遇之。……余於舊本之外，遇尋常本則擇其原版者；於原版則擇其初印者；於初印則擇其紙之長廣堅緻者。非如此則余心不快也。（丁福保編，2004，頁352）

又如民國4年（1915）條下引「丁氏藏書目·自序」云：

書籍者，索居者之良友，失途者之導師，無助者之佳伴。果寢饋於其中，能使饑者忘其食，寒者忘其衣，病者忘其痛楚，貧者忘其困乏，憂者忘其挹鬱。兼能增人之壽，益人之智識學問，而使人精神愉快之一物也。……夫古人讀書，必手自繕寫，蓄書至千卷，所費已不貲矣！自板刻行而得書甚易，費亦較省。今則新刊日增，石印鉛版，又充滿於書肆。惟坊本紙墨陋劣，陶陰魯魚之譌，別風淮雨之感，觸目皆是。得鉛石印十，不如得木版一；得新刻十，不如得舊刻一。所以書貴精而不貴多也。（丁福保編，2004）

又云：

余每於甲夜，迭取精刻善本，置諸几案，時時開卷讀之。尋繹其趣，如嚼諫果，待回甘而味益雋永。視其卷之首尾，昔人收藏之印，已累累如貫珠，而名人批校之手跡，亦狼藉於字裡行間。紙作深黝色，古趣盎然。……舊刻中或偶得一希見之本，一似植物學家擷得新奇之花草，細細把玩其奇，亦足醉心而悅目。（丁福保編，2004，頁358-359）

丁氏藏書之途徑，除了以行醫所得，大量購置之外，又多其他藏書家典當質押以借款者，往往從中得到珍貴善本。如《自訂年譜》民國8年（1919）條下云：

邇來多知余喜買古書，故有以古書為抵押品，向余借款者頗多。押進之書，以宋、元本為最，鈔本以毛鈔《酒邊詞》、黃鈔《皇元通雅集》為最，每本皆值百元以上。又有宋槧《魚玄機集》一本，原書僅十二葉，題跋亦十二葉，內有王鐵夫、曹墨琴夫婦題詞，吾邑韻香女道士題詩，皆精美絕倫。來質洋六百元，此為宋槧書中最有價值者。精本極多，不克悉記。（丁福保編，2004）

丁氏所云《魚玄機集》，乃袁克文（1889-1931）所藏之書，丁氏云：

袁寒雲先生有宋本《魚玄機詩集》一本，三年前曾向余質過六百元，後即贖去。今又來質去一千元，此書照時值，即千五百元，亦有人買。(丁福保編，2004，頁 358-359)

案，《魚玄機集》原名《唐女郎魚玄機詩》，黃丕烈「士禮居」舊藏，袁克文後售與潘宗周「寶禮堂」，今存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丁氏又云：

繆小山先生（繆荃孫，1844-1919）藏書最富，且多善本。一日忽攜宋版《宋文選》、明版王本《史記》等來，質千元而去。(丁福保編，2004，頁 380)

凡此，皆可一窺丁氏藏書之美富。丁氏「佛學叢書自序」云：

余自垂髫後，即喜披覽墳典，為義理、詞章、考據之學者十餘年；奔走衣食，任算學教授者六年；繙譯醫書，為人治病者十餘年，積書至十餘萬卷。而於各種學問，皆一知半解，未能深入其奧窔。惟涉獵之餘，性喜刻書，因成《醫學叢書》、《文學叢書》、《進德叢書》，凡三部。然磋跎荏苒，年逾四十，而道不明、德不立，曉夜以思，為之懼且恥，茫乎未知人生之究竟為何也！於是悉棄其向所為學，一心學佛，聚經典至萬餘卷，積數年之力，鑽研窮究，始知內典之博大精深，非世間書籍所能比擬。(蔡運辰編，1970)

可知丁氏研究佛經之時，也致力於蒐藏佛教經書，達到「萬餘卷」的龐大數量。其註解佛經的基礎，亦正是植根於此豐富的佛教藏書。

丁福保做為一位私人藏書者，有一個與眾不同的習性，就是對於所藏並不私自秘藏，而喜捐贈公藏公用。從民國 7 年起，他就已經時常捐書給故鄉無錫、晚年長住的上海兩地的學校與圖書館。無錫方面，包括無錫縣立圖書館、第一高等小學及焅實學堂⁴ 等。其中第一高小圖書館有十分之七的圖書是由丁福保捐贈的，因此特別稱為「丁氏圖書館」。民國 24 年，上海籌建市立圖書館，丁福保聞訊，率先捐出一萬五千卷藏書，民國 36 年，又再次捐書給上圖。丁福保捐書最多的一次，是民國 27 年捐給改制不久的震旦大學（原為震旦公學），二萬餘冊、五萬多卷古今圖書，其中包含大量元刊本、清人文集、舊抄本，震旦大學圖書館特設「丁氏文庫」以資紀念。1952 年，震旦圖書館併入復旦大學，復旦圖書館仍保留了「丁氏文庫」之名。

⁴ 焅實學堂成立於 1898 年（光緒 24 年），是晚清第一所實施現代化教育的小學。由楊範甫、單毓德、蔡謙培、高汝林、王鏡藻等人發起籌創，楊範甫任校長，聘華蘅芳為總教習。丁福保於 1898-1901 曾在此校任教算學，原址現為無錫連元街小學。

三、金石文字之整理

丁福保從青年時期開始，就對傳統的文字訓詁之學，深感興趣。由於時常檢閱各家《說文》之書，深感材料分散，不易閱讀比勘，而思有以補救。「說文解字詁林自敘」云：

福保少習許書，頗以徧檢各書為苦，偶尋一字，輒廢時至一二日，積書至數十種。多方搜索，尚難該備，況散見於各家文集及筆記中者，尤不可指數，往往以遺忘而難於參檢回憶。乙未歲，肄業南菁書院，時年二十有二，即擬聚大小徐及各家之說文，與各文集筆記中之論說文者，依許書之次第，逐字類聚為《說文解字詁林》一書。（楊家駱主編，1983）

乙未歲即光緒二十一年（1895），是年丁福保至南菁書院讀書，即發願購藏圖書，並有意編纂《說文解字詁林》。《疇隱居士自訂年譜》光緒二十一年條下續云：

吾聞之王益吾先生曰：「《爾雅》為群經樞轄，國朝邵晉涵《正義》、郝懿行《義疏》，大暢經旨，然待訂正者猶多。臧庸輯漢注，黃爽輯古義、翟灝補郭、錢坫釋義、嚴元照匡名、龍啟瑞經注集注，並資參究。宜蒼萃眾說，合為一書。每正文一節後，首注疏，次古注，次諸家說，全鈔弗遺。此外有《爾雅箋注》，罕見傳本。及非《爾雅》專家，而與本書相發明者，皆可臚列。再加案語，訂正舛謬，推闡遺義，務期精密。」（丁福保編，2004）

王先謙（字益吾，1842-1917）的說法，其實正與《說文解字詁林》的用意是一樣的，可見丁福保編纂此書可能是受到王先謙的啟發。據了解，丁福保後來確實也有編纂《雅學詁林》的想法，可惜未及實現（張進，2013）。

丁福保雖然很早就有志於編輯《說文》的有關材料，真正開始專著編輯卻是在民國 12 年，直到民國 17 年才正式完成正編並出版，共收入《說文》著作 182 種，1,036 卷。丁氏弟子周雲青〈說文解字詁林跋〉云：「丁師仲祐編纂《說文解字詁林》，始於癸亥（1923），至戊辰歲（1928）乃告成。」而《疇隱居士自訂年譜》則於民國 13 年（1924）條下云：「迴憶三十年前，在江陰南菁書院時，擬編纂《說文解字詁林》及《文選集注》二書，時作時輟，久未告竣。今欲了此二願，故先將《說文》、《文選》未完之稿，日夜董理之，然非五六年不能出版」（丁福保編，2004）。大概是丁氏晚年追記其事，因而年代略有參差。

《說文解字詁林》正編出版後，丁福保並未停止資料的蒐集工作，民國 21 年又完成《說文解字詁林補遺》一百七十卷。《說文解字詁林補遺》「序」云：

曩輯《說文解字詁林》一書，自印行至今已逾五載，而余又續得近代《說文》鉅著及經師文集、筆記之可采者甚眾，取其於說文有勦獲，於六書有討論，又有釋某字某句等多至數百篇，爰仍按《詁林》舊例，依類編次，名曰《說文解字詁林補遺》。以各書原有之卷數及單文零義之湊合成卷者計之，凡百七十卷，聊以補原輯之不逮云爾。（楊家駱主編，1983）

丁福保自青年時期立志編纂《說文解字詁林》，可說念茲在茲，數十年無日或忘，其藏書樓特地命名為「詁林精舍」，亦藉以紀念其編書之勞。蔣維喬⁵〈詁林精舍記〉云：

滬濱商肆櫛比，交通頻繁，至其地者，終日車聲機聲，震耳欲聾。惟西北隅較僻靜，宜於居宅。吾友丁君仲祐築精舍於其間，名之曰「詁林」，則以仲祐編輯《說文解字詁林》於此也。仲祐輯此書，以三十餘年之力，廣搜治《說文》之學說，……俾讀者檢一字而得數十家之義，便莫大焉。……夫學者之著述，大率不出二類：一則發表自己之心得，一則整理舊聞，同條共貫，俾讀者得省日力，犁然有當於心，是即孔子之述而不作，其功較前者尤大。仲祐之作，此物此志也。精舍在仲祐住宅之旁，凡三楹而層樓。入門，中間為廳事，東為客室，西為食室。登樓，則圖書滿架，古今要典咸備。仲祐寢饋其中，雞鳴即起，張燈疾書，至午夜不倦。雖嚴冬盛夏，而工作未嘗稍輟，故能成此宏博之鉅著。而《詁林補遺》百數十卷，又已在屬草之中，嗚呼！何其盛哉！（楊家駱主編，1983，第 2 冊，頁 1337）

對於丁福保編輯此書的狀況，有所敘述。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問世後，立即得到當時學術界的肯定，引起很大迴響。其書雖一再重版，仍然供不應求，至今不衰（楊家駱主編，1983，第 1 冊，頁 20）。⁶ 以下略述其對文字學界之貢獻與影響：

⁵ 蔣維喬（1873-1958），字竹莊，號因是子，江蘇武進人。光緒 21 年考入南菁書院，與丁福保同學。民國後歷任教育部秘書長、參事，主持小學教科書之編輯。因青年時期體弱多病，自創「因是子靜坐法」，並宣揚佛教，著有《中國佛教史》等，影響甚大，為民國知名之佛教居士。

⁶ 1988 年，北京中華書局又據民國 17 年上海醫學書局本影印；2006 年，雲南人民出版社將其列入《二十世紀學術要籍重刊》內，重印出版，採用民國石印本為底本，經電子掃描修版，使文字更加清晰；並以計算機技術重新編制索引，檢索更為便捷。凡此都說明《說文詁林》之重要性及需求量迄今未減。

(一) 集中資料，方便檢索。

《說文解字詁林》最大的貢獻就是將歷來研究《說文》的著作盡量搜集在一起，尤其是清代研究《說文》的著述，無論專書、單篇論文都搜羅靡遺，方便後人的運用。問世當時即已普遍得到肯定，如于右任先生曰：「許氏《說文》一書，為研究國學必備之籍。惟自遜清乾嘉以來，關於《說文》之著作，不下二三百種之多，學者如欲檢查一字，非遍檢各書不可；而單文零義之散見於各家文集及筆記中者，一時尤難檢閱。今丁君編輯此書，合原書一千餘卷，囊括有清一代許氏之學，匯為淵海。檢一字而頃刻即得，得一字而各說咸備。凡古書中之所謂某為正字、某為借字、某為古文、某為異文等，昔人窮老盡氣而不得者，今費半小時即可得之。所以此書一出，不僅集許學之大成，實亦治《說文》者最便利之捷徑也！」又胡樸安先生〈通告中國學會各會員〉云：「會員丁福保先生所編之《說文詁林》，採書一百八十二種，一千三十六卷，其前錢可廬（大昭，1744-1813）、王南陔（紹蘭，1760-1835）所未竣功者，至丁先生始成之。予讀其書，有四善焉：一、檢一字而各學說悉在也；二、購一書而眾本均備也；三、無刪改，仍為各家原面目也；四、原本影印，決無錯誤也。故無論藏有文字學書或未藏有文字學書者，皆不可不備此書。」（楊家駱主編，1983，第1冊，頁21）

(二) 開創體例，後繼不絕

雖然前引《說文解字詁林》「纂例」已言及，古代以「林」字做為書名的著作已有很多，但是畢竟將一書之各種訓釋研究不加剪裁、完整收集在一起，應是以《說文解字詁林》為起始，所以後來的學者，繼承延續此一體例的頗不乏人，如《爾雅詁林》（朱祖延主編，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廣雅詁林》（徐復主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甲骨文字詁林》（于省吾主編，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金文詁林》（周法高主編，香港中文大學，1975年）、《古文字詁林》（李圃主編，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2005年）、《虛詞詁林》（謝紀鋒主編，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等，不但有繼承，也有開拓。

(三) 肯定說文，評價謬說

自從清末發現甲骨文開始，傳統文字學研究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對於傳統文字學的核心著作《說文解字》的態度也有所轉變。比較激烈的人，甚至主張要廢棄《說文》，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補遺》「自敘」舉了一個例子，云：

客曰：「近讀石一參先生《六書淺說》，對於許氏毒詈痛罵（謂漢代有一個最不通文字而強作解字的偽古文家姓許名慎，別號叔重，他著了一部好書，名曰《說文解字》，其實他約畧曉得解字，全不知道說文。他於六書除象形外，可算完全不通解的。最荒謬的，他因為不通諧聲的方法，便硬鞞形聲一門，將建類一首的字歸入其中，淺陋可笑。又斥許氏為東漢偽古文家的走卒，又謂許慎之謬造《說文解字》一書，即偽古文家造言亂制之一端也。又罵之曰該死的許慎等等）。又著《說文匡鄆》三種：一部首匡謬，二古文匡謬，三形聲匡謬。石氏之書亦將采入補遺中乎？」丁子曰：「通人著述，信今傳後，平情而談，自有顛撲不破之真理存焉，何事類村婦之破口嫚罵，有乖雅道？昔明陳耀文氏撰《正楊錄》，專糾楊慎之譌，釁起爭名，語多攻訐，醜辭惡謔，無所不加。清初吳爰氏撰《正錢錄》，專攻錢謙益之譌，深文苛索，有意求瑕，挾怨構爭，憤若讐寇。清初朱直氏撰《史論初集》，專駁有宋胡寅氏之《讀史管見》，每詆氏為腐儒，為矇矓未視之狗，為雙目如瞽、滿腹皆痰，為但可去注三字經、百家姓，不應作史論。為癡絕呆絕、稚氣腐臭。是雖胡氏持論之酷，原有激萬世不平之氣，然亦不當如是之毒詈也。近人關於小學之著作，每欲推倒許氏，別創六書，信口開河，嚮壁虛造。較之楊桓氏《六書統溯原》、魏校氏《六書精蘊》且什伯倍蓰過之，宜乎學者得其書，每掩卷而不欲觀也。」（楊家駱主編，1983）

《說文解字詁林》「自敘」有云：「蓋其書集篆籀之大成，而又博采通人，不囿己見，故吾人處千載之下，而獨得見古人造字之精神者，賴有此書之存。昔人謂許氏之書之功，不在周公《爾雅》下，豈虛語哉！」平心而論，許慎《說文解字》是有許多錯誤，甚至「嚮壁虛造」之處，但是其成書之時，去古猶未遠；以小篆為解說文字之根本，確也可上通甲骨、金文，是研究古文字的重要橋樑，丁福保加以肯定的立場，無疑是正確的。

（四）罕見文獻，沾溉後人

丁福保編纂《說文解字詁林》時，不但盡量搜集各種研究《說文》的成果，也非常注意版本的選擇，有些是流傳較少、較為罕見的文獻，後人不必辛苦訪求，從《說文解字詁林》即可讀到。如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其中引用許多《說文》的資料，中國自宋以後即失傳，《大正藏》亦未收，清末楊守敬於日本訪書，得到一部影抄本，帶回國內，但流傳不廣。丁福保於日本留學時，偶然得到一部仿宋刻本，後來即收入

《詁林》。〈說文解字詁林後敘〉云：「正續《音義》可以校補許書者甚多，余擬逐條錄出，附注大徐本後，以備學者之參攷。」

（五）編纂理論，開啟典範

《說文解字詁林》全書分為前編、正文、後編三部分，前編又分為上、中、下三部分，所收內容是，前編上一序跋類，收集所採各書原來的序跋，也有各類別集中與《說文》有關的單篇序跋；前編中一六書大義，收集各種討論解說六書的文章，又細分為六書總論、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前編下一《說文》總論及分論，收集有關討論《說文》的文章，主題包含《說文》的字數、分部、部首、說文例、古文或體、篆隸之變、說文引經、說文引群書、說文聲音、重出字、新附、逸文、竄改、雜論等。整體而言，前編所收是屬於研究《說文》的理論部分，也是集傳統中國文字學理論之大成，對於後人研究文字學，開啟了優良的典範。

除了對於《說文》資料的整理之外，丁福保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另一項重要貢獻，就是對於古錢幣文獻之整理，對於民國以來的「古泉學」研究，也是影響甚大。首先，丁氏在民國 25 年，編成《古錢大辭典》，其「自序」云：

余家舊藏《泉志》、《古金錄》等書，尚是先曾祖手澤，又有古錢數百枚，藏弃惟謹。余前因編纂《說文詁林》，費時三十餘年，致古錢無暇整理。前歲《詁林》及《詁林補遺》均已出版，杜門養疴，端居多暇。因將先世所遺古錢，及三十年前購自經師者，整理一番。又先後購得晴韻館主人金錫鬯氏及方氏、袁氏所藏大批古泉，朝夕摩挲，詫為奇觀。又借得劉燕庭、鮑子年兩先生古泉拓本二百餘冊；龔孝拱、楊惺吾、高翰伯拓本十二冊；方藥雨先生之〈古化雜咏〉等，反覆辨證，俾余老眼益明。因選各拓本中之精品，凡數千枚，用西法照相，製成銅版，印入書籍，與真拓本絲毫無異。不及一年，銅版告成，歡喜殆出意外。余於古錢寢饋既久，因此擬編輯《古錢大辭典》。（丁福保，1993）

對於編輯此書的原因，有所說明。其「例言」則云：

本書分為二部分：一為古錢圖，一為辭典。古錢圖分為三類：以古布、刀幣為一類；朝代錢、外國錢、無考品為一類；壓勝、吉語支錢、馬錢等為一類。辭典以正史中之〈食貨志〉及帝紀、列傳，與鑄錢有關係之文字，並各家錢譜之學說，皆條分件繫於各錢之下。凡各錢關於歷史上之考據，

及各學說之是非得失，閱者皆可一覽瞭然，與古錢圖相附而行。(丁福保，1993)

說明此書之體例。此後丁氏又將各種錢幣學研究文獻，加以整理、改編，再附以自己的著作，於1940年出版了《古泉叢書》，內容包含丁氏著作三種（《古錢雜記》、《古錢有裨實用譚》、《古錢學綱要》）；影印前人錢譜六種（呂儉孫《毗陵出土孝建四銖拓本》、陳介祺《六泉十布拓本》、張廷濟《古泉拓本》、蔡云《癖談》、唐與崑《制錢通考》、鮑康《大泉圖錄》）；改編前人圖譜三種（《泉志菁華錄》、《泉苑菁華》、古泉叢話合刻）、《觀古閣泉說》。除了整理錢幣學文獻之外，丁福保也創立了「中國古泉學會」（1936年，上海），出版《古泉學》刊物。1940年，又成立「中國錢幣學社」，出版《泉幣雜誌》。凡此，都對推動古代錢幣學的研究，居功甚偉（戴志強，2009）。

四、詩學文獻之整理

丁福保對於詩學文獻整理主要的成果，有《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八代詩菁華錄箋註》、《歷代詩話續編》、《清詩話》等的編纂，限於時間與篇幅，本文擬先析論《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之編纂，初步展現丁氏詩歌文獻整理之成就。

丁福保編纂《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的動機，與丁氏從青年時期開始，就對魏晉南北朝文學很有興趣有關。《疇隱居士自訂年譜》光緒十四年條下云：

稚暉先生⁷作〈寒厓詩集序〉，述當年之情形最詳，因節錄之如下：……敬恒所家無錫，時流年相若，談說文史，與南菁諸子上下者，則有廉泉、俞復、⁸丁寶書、⁹顧蔭孫、裘慶年、昌年、曹銓，及寶書弟福保。福保亦一

⁷ 吳敬恆（1865-1953），字稚暉，江蘇武進人。幼讀私塾，光緒十五年（1889），入南菁書院就讀，十七年（1891）舉於鄉。甲午戰後，開始接受新思潮，光緒二十四年（1898）至南洋公學任教，與康、梁為友。二十七年東渡日本留學，二十九年轉赴英國，結識孫中山先生，自此投身於國民革命。民國肇建，積極推動教育文化事業，歷任監察委員、國民大會主席等要職。著有《上下古今談》、《荒古原人史》、《吳稚暉選集》等。

⁸ 俞復（1866-1831），字仲還，無錫人。光緒二十年舉人，赴京會試時，參加康有為「公車上書」，思想趨向於變法。光緒二十四年，與吳稚暉等創辦無錫三等公學堂，二十七年參加勵志學社，任副會長，鼓吹反清革命，後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後，先後任錫金軍政分府民政部長、無錫縣民政署民政長。民國6年，任上海文明書局經理，並與丁福保等人發起成立「少年進德會」，

奇童子，年十四、五即通治漢、魏、六朝數十百家之文，後亦膺選居南菁頗久。(丁福保編，2004，頁300)

丁氏不僅熟讀漢魏六朝各家文集，也喜作古詩。《年譜》光緒十六條下云：

讀《文選》，學作古詩。稚暉先生與家兄（丁寶書）書云：「令弟經藝愈讀愈好，若能用力《選》學，更不做雜亂浮想，當是近來一大作手。」（丁福保編，2004）

光緒十七年條下又云：

孫寒厓先生¹⁰應課南菁書院，批余詩後曰：「稚暉、芸軒謂我圈得太多，我亦並未得賄，何必諂諛？存之篋中，以待來者。時許文伯在座，與我亦同此論，贊賞不已。上海鈕鐵生¹¹在室，亦嘖嘖拍手睜目、咋舌跳腳，並非虛語。孟兼亦可對證。」（丁福保編，2004）

可知丁氏早年亦以能為古詩知名。丁福保還著有《詩鑰》一書，做為指導初學作詩者的入門書（丁福保，2007）。

至於《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的編纂經過，丁氏在此書「緒言」中有詳細說明：余十四五歲時，即喜搜集漢魏六朝人詩，每讀必屏絕人事，讀必數十過。如是者有年。嗣後奔走南北，所至見有漢魏六朝人別集或總集，必購以歸，嗜之成癖，根著膠固。每獲一異本，則津津喜見眉宇，意世間所謂樂事，無以易此，如是者又有年，余書室中，魏漢六朝人詩略備矣。惜余之所謂

出版季刊《少年進德彙編》，民國16年，出任無錫縣縣長，並兼理司法。民國19年，任國民政府教育部秘書。工書法，擅顏真卿體，曾參與《錫山先哲叢書》的編輯工作。

⁹ 丁寶書（1866-1937），字云軒，別署芸軒，性喜繪畫。光緒十九年（1893）恩科副貢，就讀江陰南菁書院。二十四年（1898），與吳稚暉、俞復等人在無錫崇安寺創立三等學堂，任國文教習。三十二年（1906），應聘上海文明書局美術編輯，兼任附設文明小學教員。其畫作重視寫生，師法自然，所作花鳥草蟲神態栩栩如生，色彩鮮明雅純，別具一格，荷花尤佳。中年後學佛，撰《大乘起信論解》8卷。又有《芸軒畫粹》、《丁芸軒題畫詩集》等行世。

¹⁰ 孫揆均（1866-1941），字叔方，又名道毅，號寒厓、叔舫、來鶴樓主人，江蘇無錫人，工詩善書，得褚遂良真韻，清俊蒼秀，詩亦蒼樸，有《寒厓集》傳世。

¹¹ 鈕永建（1870-1965），字惕生，筆名鐵生，上海人。曾就讀南菁書院，光緒二十年（1894）舉人，二十一年，入湖北武備學堂，轉而從軍。光緒二十五年（1899），赴日留學，追隨孫中山先生參與革命活動。民國元年以後，歷任江蘇省政府主席、國民政府秘書長、考試院副院長、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等要職。台北市私立強恕中學前身即為鈕氏於1899年在上海創辦之強恕學堂，1950年在臺復校

略備者，以後世編輯之書為多，如漢書藝文志、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隋書經籍志、漢魏六朝各家集散佚已久，今皆不可得而見也。(丁福保，1968，總論)

此節丁氏自述其從青少年時期即已酷愛漢魏六朝人之詩作，收集各種別集、總集略備，但所得多為後世人所編輯者，而非更古老的版本。由後段所論而觀，此處所謂的後世之人，指的是明、清兩朝。

唐以前詩之見於別集者，不過二十餘種（《蔡邕集》、《曹植集》、《阮籍集》、《嵇康集》、《潘岳集》、《陸機集》、《陸雲集》、《陶潛集》、《謝靈運集》、《鮑照集》、《謝惠連集》、《顏延之集》、《謝朓集》、《沈約集》、《梁武帝集》、《梁昭明太子集》、《梁簡文帝集》、《梁元帝集》、《江淹集》、《任昉集》、《陶宏景集》、《何遜集》、《陰鏗集》、《徐陵集》、《庾信集》）。見於總集者亦不過二十餘種（梁《昭明文選》、陳徐陵《玉臺新詠》、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元左克明《古樂府》、明馮惟訥《詩紀》、李攀龍《詩刪》、陸時雍《詩鏡》、梅鼎祚《八代詩乘》及《古樂苑》、曹學佺《歷代詩選》、楊德明《建安七子集》、汪世賢《漢魏名家二十一集》、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臧懋循《古詩所》、張之象《古詩類苑》、鍾惺譚元春《古詩歸》、屠峻《情采編》、唐汝諤《古詩解》）。除《文選》、《玉臺》、《樂府》外，大半為明人纂輯本。惟明人刻書，往往泥沙雜揉，愛博而無所持擇，又喜任臆改竄、變亂舊帙次第，竟有顛舛百出，無知妄作者，此豈明末士習輕挑放誕之所至歟！有清一代之總集，採輯唐以前之詩者，亦不過數種（王士禎《古詩選》、沈德潛《古詩源》、張琦《古詩錄》、劉大櫟《列朝詩約選》、王錫光《詩義標準》、王闓運《八代詩選》），往往為明人所誤，謬種流傳，如塗塗附，其疵類亦指不勝屈也。

此節是綜述清代以前漢魏六朝詩之別集與總集流傳的情況，並特別批判明人編纂書籍之謬誤。案，丁氏所舉之總集類，稍有遺漏，如劉節《廣文選》、楊慎《古今風謠》、《風雅遺編》、王夫之《古詩評選》、王士禎《古詩箋》、孫星衍《續古文苑》等，均未列入。而清初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之重要性，也不在諸家之下，似亦為丁氏所未曾寓目。陳祚明（1623-1674），字胤倩，浙江錢塘人。明末諸生，入清不仕，以著書授館終老。著有《采菽堂古詩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稽留山人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等。

事實上，丁氏編輯《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也是前有所本而精益求精。丁氏云：是書體例大率遵馮汝言先生之《詩紀》而損益之，其訂誤各條，多本馮默菴先生之說。余讀馮氏書有年，殘膏賸馥，沾溉無窮，篳路椎輪之力，不可沒也。

案，馮惟訥（1513-1572），字汝言，號少洲，山東臨朐人。舉嘉靖十七年（1538）進士，歷官宜興縣知縣、江西左布政使、光祿寺卿等，與兄惟健、惟敏皆有文名。著有《青州府志》八卷、《馮光祿集》十卷、《古詩紀》山一百五十六卷、《風雅廣逸》八卷、《文獻通考纂要》等。其《古詩紀》影響最大，《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八十九云：

其書前集十卷，皆古逸詩；正集一百三十卷，則漢、魏以下，陳、隋以前之詩；外集四卷，附錄仙鬼之詩；別集十二卷，則前人論詩之語也。時代綿長，采摭繁富，其中真偽錯雜，以及抵牾舛漏，所不能無。故馮舒作《詩紀匡謬》，以糾其失。然上薄古初，下迄六代，有韻之作，無不兼收，溯詩家之淵源者，不能外是書而別求。固亦采珠之滄海，伐木之鄧林也。厥後臧懋循《古詩所》、張之象《古詩類苑》、梅鼎祚《八代詩乘》，相繼而出，總以是書為藍本。然懋循書，雖稱補此書之闕，而捃拾繁猥，珠礫混淆，又割裂分體，不以時代為次，使閱者茫不得正變之源流；之象書，又以題編次，竟成類書；鼎祚書，僅漢、魏全錄，晉、宋以下皆從刪節，已非完備之觀。而漢、魏詩中，如所增〈蘇武妻詩〉之類，又深為藝林之笑噓，故至今惟惟訥此編，為詩家圭臬。（清·永瑤等編，1968，第5冊，頁72）

可知馮書在古代詩歌史之地位。丁福保的《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正是在馮書的基礎上，改正其錯誤，增補其未備，因而出版之後，立即風行海內，歷久不衰。又丁氏據以訂正馮書的《詩紀匡謬》，為清·馮舒所作，¹² 僅一卷，以條列方式，對《古詩紀》進行各種的糾正改錯。書前有「詩紀匡謬引」云：

《詩紀匡謬》者，馮子發憤之所作也。曷為而發憤？憤詩之為《刪》、為《歸》也。曷為匡及於《紀》？曰：正其始也。今天下之誦詩者何知？知《刪》

¹² 馮舒（1593-1649），字己蒼，號默庵，清江蘇常熟人。與弟馮班（1602-1671）齊名，為清初著名詩人與藏書家，著有《空居閣雜文》二卷，《炳燭齋文》一卷，《文谷》二卷，《歷代詩紀》一百卷，及《空居集》等，又有《詩紀匡謬》一卷，《校定玉台新詠》十卷，事蹟見《清史稿·列傳》。

而已矣！知《歸》而已矣！為《刪》、為《歸》者又何知？知《紀》而已矣！奴之子為重儻木心邪？則脈理不正所必然也。於是為之原其源，溯其流，核其濫觴於何人，而後為《刪》、為《歸》之邪說不攻自破矣！邪說破而後興觀群怨、溫柔敦厚之旨可以正。告之天下，豈好辯哉？（馮舒，1984）

可知馮舒將明人編輯古詩總集的謬誤歸咎於《古詩紀》。然而丁福保對於《詩紀匡謬》雖然參考引用，但也有自己的意見與增補，還是有進步的。

在本書「緒言」裡，丁福保陳述了編纂此書時的一些理念，與考訂辨正前人疏誤的地方，提出了有價值的意見。茲歸納簡述如下：

（一）關於作者之考辨

例如著名的李陵、蘇武詩，丁氏云：

《古文苑》有李陵〈錄別詩〉八首，又有蘇武〈答李陵詩〉、〈別李陵詩〉各一首，皆標明蘇、李所作，宋·章樵注《古文苑》，因大蘇疑《文選》中蘇李贈答五言為偽作，遂並以十首為非真。明人選刻古詩，竟列此於無名氏之中，改其題為〈擬蘇詩十首〉，故有清一代之各選本，無不削蘇李之名而以為後人所擬。然蘇、章二氏之所疑者，皆憑空臆度之辭，非有真實確據也。且此等詩在趙宋以前，亦無有疑其偽託者，試觀《藝文類聚》之所載，皆確定為蘇李，況「二鳥俱北飛」，《初學記》亦指為蘇武別李陵詩，杜子美云：「李陵、蘇武是吾師。」子美豈無見哉？東坡晚年跋黃子思詩云：「蘇李之天成」，尊之亦至矣。其曰六朝擬作者，一時鄙薄蕭統之偏辭耳，蓋東坡亦自悔失言也。故余以此十首，宜從《古文苑》及《藝文類聚》等，定為蘇李所自著，不可從《古文苑》之注及《詩紀》等，妄定其為後人所擬也。

此節以蘇武、李陵之贈答詩為例，指出明、清古詩選本將二人之詩列為偽作，並不正確，而主張應依據《文選》，將二人之名氏與詩作恢復。案，李陵、蘇武二人的贈答詩，最早著錄於《文選》卷二十九「雜詩上」，「李少卿與蘇武詩三首」、「蘇子卿詩四首」，合計七首。然而自南北朝宋、齊以下，很多人都懷疑這幾首詩不是蘇、李自作，而是後人偽托之作。直到近現代，這個問題一直沒有得到確切的解決，正、反雙方各有理由，爭論不休。大致而言，以認為這幾首詩是出於東漢末士人擬作，也就是「偽作說」的人比較多，各種中國文學史也大都採用此說（武平英，2010）。然而不少當代學者則是採「折衷說」，也就是認為在沒有發現更直接、更明確的偽造證據之前，

還是應該尊重《文選》、《詩品》¹³ 等早期文獻的記載，視這幾首詩是蘇、李自作的（章培衡、劉駿，1998）。丁福保的看法即屬於「折衷說」。

（二）關於作品之考辨

例如詩歌定義與範圍的問題，丁氏云：

《古詩類苑》、《詩紀》等，往往將箴、銘、頌、讚及賦後之歌詩，隨意剽掇。而不知文章各有體裁，著述各有斷限，不可以非詩而妄作為詩也。

班固〈兩都賦〉後有明堂等詩、張衡〈思玄賦〉後有系曰云云，〈定情賦〉後有歎曰云云，皆賦後有所述，非別篇也。明人選本，每割〈兩都〉後為明堂等詩、割〈思玄賦〉系曰之後為思玄詩、割〈定情賦〉歎曰之後為定情詩，後學往往為其所不能辨別。又如簡文之〈蓮花賦歌〉、陳·江總之〈南越木槿歌〉，亦皆賦末所係也，均宜刪。賦至南北朝時，其後有詩歌者甚多，豈可一一割之而自為一詩乎？明·臧懋循竟以庾信諸賦之句，雜七言者收入《古詩所》，鍾、譚二氏竟將《焦氏易林》選入《古詩歸》，尤為割裂冗雜、茫無體例，此所謂變本加厲也。

案，馮班（1984）《詩紀匡謬》云：「原夫書契既興，英賢代作，文章流別，其來久矣。若箴、銘、頌、誄，可以備載，則賦亦詩家六義之一，何以區分？若云有韻之文，可以廣收，則《國策》、管、韓之屬，何往非韻？《素問》一書，通篇有韻；易之「文言」，本自聖製，書之『敷言』，出於孔壁，亦自諧聲，不專辭達，可得混為詩耶？」析論甚詳，為丁氏所本。然而遼欽立（1988）云：「箴、頌、銘、贊以及誄、賦，皆各具體製，與詩不同，今皆不錄。惟賦中所附之詩歌，如張衡「思玄賦詩」、趙壹「刺世疾邪賦詩」、梁簡文帝「蓮花賦歌」等，今悉錄存，以廣詩囿，蓋此等詩歌本身抑已結構完備也。至於息夫『絕命』、王吉『祝詞』，亦皆列入」。明顯又採取較寬泛的標準。

（三）關於字句之考辨

例如：

¹³ 最早直接肯定蘇、李詩價值的應該是梁·鍾嶸《詩品》，其〈詩品上·漢都尉李陵詩〉云：「其源出於《楚辭》，文多悽愴，怨者之流」（曹旭，1996，頁88）。《文心雕龍·明詩》雖然提到李陵詩，但云：「詞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可見劉勰是持懷疑態度的（周振甫，1984，頁84）。

漢武帝「李夫人歌」，見於《漢書》、《藝文類聚》、《樂府詩集》，「偏何姍姍其來遲？」偏皆不作翩，《詩紀》、《詩鏡》、《古詩選》、《古詩源》等皆誤作翩字。

「昔有霍家姝」，後世選本皆改姝字為奴，檢宋本刻《玉臺新詠》、《樂府詩集》俱作姝，蓋古時士之美者亦曰姝，如「干旄」之詩，稱「彼姝者子」是，其妄改者不得藉口「霍光傳」有「監奴馮子都」之語也，試檢明初趙則古《學範》，¹⁴ 亦作霍家姝，此時尚未經後人妄改，故仍作姝字。

「代劉勳妻王宋」詩第二首末一句「不得共之」，共字各本誤作往，《玉臺》吳兆宜本又誤作並，共與重字、奉字為同韻，宋《坦齋通編》¹⁵ 可證也。

(四) 關於章節之考辨

例如：

徐幹有「室思」六首，見《玉臺新詠》。明人截其前五首，名曰「雜詩」，以「人靡不有初」一首仍為「室思」，嗣後之選詩者皆承襲其謬，而不知更正。如漁洋《古詩選》有徐幹詩二首，一為「室思」、一為「雜詩」，而不知其所謂雜詩者，即「室思」也。此詩非但載於《玉臺》，又見《藝文類聚》三十二，又有宋武帝擬作可證，此種謬誤各選本皆不能免，宜據《玉臺》、《藝文》校正之。顏延之「秋胡」詩，《文選》作一首，《玉臺》分為九章，亦為一首，此正如「關雎」三章，原只一篇，自《詩紀》分之為九首，而《詩刪》遂摘取三章矣。有清一代之選本，無不承襲其誤，分之為九首，此宜仍合為一篇。

丁氏在本書「緒論」之結論部分，對於漢代以下至隋代的詩歌發展，做了回顧與總結，其詩歌理論也可藉以略作探討。

¹⁴ 此處之「趙則古」似應作「趙古則」，即明初趙謙（1351-1395），名搗謙，字古則，學者號為考古先生，浙江餘姚人。師從鄭四表，為胡雲峰四傳弟子。其治學雖以理學為本，亦主由聲韻文字入手，著有《聲音文字通》一百卷、《六書本義》十二卷。洪武二十二年，召為瓊山縣教諭，為獎掖人才，撰《童蒙習句》、《學範》等書。見《明儒學案》卷四十三。

¹⁵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18云：「《坦齋通編》，不著撰人名氏。《說郛》題曰宋·邢凱撰，亦不詳其爵里時代。……其書多考證經史，略如程大昌《演繁露》、洪邁《容齋隨筆》之體。……是書《宋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著錄，其原本卷帙不可考。今據散見《永樂大典》者，逐韻掇拾，編為一卷，雖所存僅數十條，而可取者特多焉」（陳祚明評選，2008，第3冊，頁573）。

1. 詩歌至漢朝而真正成熟，五言、七言都已成為正式體制，所以總集詩歌應從漢代起，而不錄先秦之詩。
2. 學習、研究詩歌作品，應從文獻考據入手，依據完整而正確的本子，熟讀體會，自能成一家之言。

五、佛教典籍之整理

丁福保接觸、信仰佛教的經過，也是與其生平經歷有關。《自訂年譜》光緒 29 年（1903）條下云：

五月二十七日，為經濟特科覆試之期，余趁此時機，欲至內城一遊。天甫明，即起，著衣冠，與吳君和甫，進東華門。見華師若溪、¹⁶ 楊範甫、¹⁷ 楊仁山、聶雋威¹⁸ 先生等，皆在焉。

其中楊仁山即近代著名的佛教居士楊文會（1837-1911），字仁山，號深柳堂主人，安徽石埭人。自幼讀書，即不喜科舉業。早年習儒學，並學天文、地理、曆數、音韻等。同治三年（1864），始得《大乘起信論》、《楞嚴經》等，反復讀誦，領會其中奧義。同治五年（1866），創設「金陵刻經處」，發心刊刻《藏經》。光緒三十四年（1908）設立「祇洹精舍」，培養佛學人才，自任講席，太虛即出其門下。丁福保與楊仁山之會面，時間雖甚短暫，但言談之間必然涉及佛教佛法，乃情理中之事。後來丁氏註解經書、出版佛經，也曾多引楊文會之語。《自訂年譜》光緒三十一年（1905）條下又云：

¹⁶ 華世芳（1854-1905）清末數學家，字若溪，號萇齋，江蘇無錫人。與兄華蘅芳（1833-1902）同為晚清數學家，曾校核華蘅芳與傅蘭雅（John Fryer, 1839-1928）合譯的《代數難題解》。光緒二十年，任湖北武昌自強學堂數學教習。二十二年，主講常州龍城書院和江陰南菁書院。三十一年，任上海南洋公學總教習，旋又任北京商部高等實業學堂教員。著有《近代疇人著述記》、《恒河沙館算草》、《勾股三角》等。

¹⁷ 楊模（1852-1915），字範甫，號蟄庵，江蘇無錫人。光緒二十年舉人，歷任天津武備學堂、湖北自強學堂、山西武備學堂等校教習，畢生以提倡新學、致力於基礎教育為己任。

¹⁸ 聶其昌（1879-1954），字雋威，湖南衡山人，為世家子，其母曾紀芬（1852-1942），號崇德老人，為曾國藩幼女；其妻左元宜（1875-1936），為左宗棠長孫女。擅書法，曾隨華蘅芳兄弟習數學，傅蘭雅夫人學英語，後任其家族企業恒豐紡織廠董事。丁福保所記，當即其在華氏兄弟門下之時也

余見俄文教習余君梅生處，有《釋氏語錄》，假歸讀之，因錄數語為座右銘，……又作〈無詩〉一首，其詞曰：「本來無物自無塵，無欲無憂閒道人；無死無生常寂滅，無分別處絕怨親。」此為余讀佛書之始。(丁福保編，2004，頁 320)

丁氏時年 32 歲，初讀佛書，即能有深刻體會，且發而為詩，也似頗有意境，丁氏也可說是深具慧根之人。《佛學大辭典》「自序」云：「余自四十以後，皈依象教，¹⁹ 發願箋註佛經……」，此事《年譜》中亦有述及。民國 5 年（1916）條下云：

余自陰曆除夕，因受熱患傷風，遂發鼻加答兒，²⁰ 鼻因之而塞。又發氣管支加答兒，咳嗽咯痰。又發胃加答兒，嘔吐粘液。又發寒熱，纏綿至十餘日。加以氣急，消化不良，全體衰弱已極。顧來日之漸短，悼往事之可悔。

於是覽佛氏書，而有當於心，遂委身而從事焉。(丁福保編，2004，頁 361)

由於身染重病，感覺似乎已近命終之時，開始真正覺察到生命的問題，於是投身佛教信仰，這也頗符合《八大人覺經》所說：「四大皆空，五陰無我，生滅變異，虛偽無主，如是觀察，漸離生死」之理。丁氏本年 43 歲，前所云：「四十以後，皈依象教」，當即在此時。

皈依三寶之後，丁氏經常親近的佛門大德，則是近代中國最著名的淨土宗大師—印光法師（1862-1940）。法師俗姓趙，名丹桂，字紹伊，號子任。陝西省郿陽（今合陽）縣赤城東村人。父名秉綱，母張氏。弟兄三人，師最幼。初隨長兄習儒，穎悟異常。15 歲因病目，困殆數載，疾癒後一心向佛。年二十一出家為僧，法名聖量，字印光。後自號「繼廬行者」，又號「常慚」、「常慚愧僧」。33 歲後，在浙江普陀山法雨寺隱跡潛修。晚年在滬創辦「佛經流通處弘化社」，在蘇州吳縣，開創靈巖山寺十方專修淨土道場，後人奉為淨土宗第 13 代祖師（釋真達等撰，1994）。

丁福保與印光大師的交往甚為頻繁，在《印光大師文鈔》裡，收有 21 通與丁福保的書信，內容涉及廣泛，可以看出丁氏與印光大師情誼深厚。從這些書信內容來看，主要是對丁福保所編的各種佛教書籍的討論，大部分是肯定與稱讚，但也有指出其中

¹⁹ 象教，佛教之別名，亦作像教。古代將佛教歷史分為正法時期、像法時期、末法時期三個階段，印度佛教傳來中國時，屬像法時期，故稱為像教。明·陳士元撰《象教皮編》一書，即取此義。一說：佛教以形象（佛象）教人，故稱為象教。

²⁰ 加答兒（日文カタル，英文 catarrh），日本早期醫學用語，指「與器官粘膜腫脹有關的症狀」，目前醫學界已很少使用此詞（余尚儒，2010）。

的不足與疏誤之處。如「復丁福保居士書二」云：「《佛學初階》末後之『靜坐法精義』，名實不甚符合，似宜云『諸宗要典略紀』。」「復丁福保居士書四」云：「前見大著『贊佛偈』：『相好光明』作『相色光明』，臆其排印偶錯耳。今函又作『相色』，知閣下有意改之。夫此八句，乃宋桐江瑛法師，撮舉淨土三經之大義而立，無一字無來歷，何得妄改？《觀經》云：『阿彌陀佛有八萬四千相，一一相中，有八萬四千隨形好，一一好中，有八萬四千光明。』閣下深通佛法，何以見不及此？……既屬知己，不妨直詞以進」（釋印光，1994）。

丁福保因親近印光大師，其學佛修行，亦以念佛往生淨土為主，例如《六祖壇經箋註》「序」云：

若夫《壇經》所載，有「何須往生」之說，則蓮池大師辯之詳矣。蓮池言：「《壇經》皆他人記錄，故多訛誤。其十萬八千東方西方等說，久已辯明。中又云但修十善，何須更願往生。夫十善生天之因也，無佛出世，輪王乃以十善化度眾生。六祖不教人生西方見佛，而但使生天可乎？其不足信明矣！故知執《壇經》而非淨土者，謬之甚者也。」蓮池之說如此。余恐學者因《壇經》而疑淨土，故錄其言於簡首，使閱者開卷即知，逆防其趨向之或誤。蓋以修淨與參禪，正不相妨。古德所謂「有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六祖、蓮池，各各隨機說法，相需為用。參禪不礙念佛，念佛不礙參禪，在學者之善於圓融耳。此余所以既註《十六觀經》、《阿彌陀經》，而又為此經之箋註也。箋註時遇十萬八千、十善淨土等說，則引蓮池之言以訂正之。（丁福保，無年代）

案，丁氏所舉六祖之說，見於《壇經》「疑問品」，略云：

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所住處，恆安樂。」使君！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遙；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今勸善知識：先除十惡，即行十萬；後除八邪，乃過八千。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覩彌陀。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即來迎請？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剎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遙如何得達？（丁福保，無年代）

可知惠能是主張「自性淨土」的，很明顯與淨土宗主張的「淨土實有」是不同的。自從五代宋初的永明延壽（904-975）提倡「禪淨雙修」之後，試圖調和禪宗與淨土思想者代不乏人。蓮池大師即雲棲株宏（1535-1615），為明代融通禪淨思想的代表人物，

自然會對於《壇經》之說，有所辯解。再從丁氏所云：「余恐學者因《壇經》而疑淨土，故錄其言於簡首，使閱者開卷即知，逆防其趨向之或誤。」亦可知丁福保的佛學思想基本上是立足於淨土宗的。丁氏所編《學佛起信編》、《佛學指南》、《學佛捷徑》等入門書，都是闡明靈魂實有，因果報應之理，而歸本於念佛往生。又〈佛學大辭典·自序〉末云：「余註經之願於此已償，此後便當燒卻毛穎，碎卻端溪，兀然作一不識字之人，而專修禪淨矣！」亦可證其終歸淨土之思想。綜計丁氏一生出版與注解之佛經約數十種，均流通於世。而其最重要的佛學著作則是《佛學大辭典》與《丁氏佛學叢書》（丁福保，2004a；蘇精，2009）。

《佛學大辭典》是國人自編的第一部大型佛學辭典，其書經始於民國元年，完成於民國九年，十年（1921）六月出版。編纂過程中，以日本織田得能《佛教大辭典》、²¹ 望月信亨《佛教大辭典》、²² 若原氏《佛教辭典》、藤井宣正《佛教辭林》²³ 等為參考資料，書前「自序一」有云：

余自四十以後，皈依象教，發願箋注佛經，竊欲矯前賢之失，立不朽之言。……爰擬一註經之簡捷法於此：選擇諸經中之專門名詞，先去其複見者，而後釋其意義，示其出處。以第一字之筆畫，分別部居，略如《駢字類編》而嚴密其體例，使檢查者可一索而得之。倘此書果成，可做為一切經之總註。余發願註經之心，庶幾而得大遂矣，正不必逐部而箋註也。（丁福保編，1992）

可知丁氏之編纂此書，最初動機並不是如同現代人對辭典的觀念，只是編一部工具書，以供世人查檢利用。而是類似「資料匯編」性質，做為自己箋註佛經時的基礎。因此

²¹ 織田得能（1860-1911）號雲溪，日本福井縣人。十三歲出家，先後學習漢籍，及唯識、俱舍等諸宗經典。明治三十二年（1899）開始致力於佛學辭典之編纂，歷經十餘年，稿未成而病歿，後經高楠順次郎、上田萬年、芳賀矢一人編訂出版。該書堪稱為現代佛教辭典之嚆矢。此外另著有《三國佛教史略》、《暹羅佛教事情》、《法華經講義》、《和漢高僧傳》等。

²² 望月信亨（1869-1948），日本新瀉縣人。先後修學於淨土宗大學、比叡山。歷任淨土宗高等學院教授、大正大學教授、校長。曾參與《淨土宗全書》、《大日本佛教全書》之編輯。自明治三十九年（1906）起編纂《佛教大辭典》與《佛教史年表》，為研究佛學不可或缺之工具書。其他著作有《淨土教の起原及發達》、《支那淨土教理史》等書。

²³ 藤井宣正（1859~1903）日本新瀉縣人。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科畢業，曾任琦玉縣第一中學校長。1902年參加大谷光瑞之中亞探險隊，協助調查中亞及印度的佛教遺跡。

在《佛學大辭典》的前面，還附有一篇「敬告注佛經之居士」，說明自己對於箋註佛經的看法（丁福保編，1992）。

除了《佛學大辭典》以外，丁福保所編撰及注解的各種佛學書籍，原本皆為各自單行，但各書之扉頁仍均標示《丁氏佛學叢書》之名，事實上終其一生，並未集結成叢書型態。至民國 59 年（1970），蔡運辰居士纔在臺北彙集各書而成為一部叢書，並予以出版，²⁴ 分為首編、前編、中編、後編，其中編及後編所收，即丁氏注釋的各種經書，凡 16 種（若《心經》兩註只計其一，應為 15 種），茲列其目錄如下（依原本各經扉頁標示之數字為序）：

1. 《佛說八大人覺經箋註》
2. 《心經箋註》
3. 《佛說四十二章經箋註》
4. 《佛遺教經箋註》
5. 《觀世音經箋註》
6. 《高王觀世音經箋註》
7. 《金剛經箋註》
8. 《佛經精華錄箋註》
9. 《阿彌陀經箋註》
10. 《盂蘭盆經箋註》
11. 《無量義經箋註》
12. 《觀普賢菩薩行法經箋註》
13. 《觀無量壽佛經箋註》
14. 《六祖壇經箋註》
15. 《無量壽經箋註》
16. 《心經詳注》

叢書中還收錄了丁氏為引導初學佛法的人而編寫的入門書，如《佛學撮要》、《佛學起信編》、《佛學指南》、《六道輪迴錄》等。

²⁴ 蔡運辰（1901-1992），號念生，法名寬運，遼寧省鳳凰人。曾任國大代表、考試院秘書，1956 年起，任「修訂中華大藏經編委會」總編輯，並編纂《二十五種藏經目錄對照考釋》。早年曾向丁福保請教佛學問題，以此因緣，於臺灣編輯《丁氏佛學叢書》，1970 年由北海出版事業公司出版。

從《丁氏佛學叢書》所收錄之各經書來看，除《佛經精華錄》是採錄多種經典的內容而成外，大致都是一般較為普及易見的經書，丁氏自言還要注解《法華經》、《楞嚴經》、《楞伽經》、《華嚴經》、《維摩經》、《成唯識論》等數十部，似均未完成。筆者認為，丁氏注解佛經的貢獻，不在於註經的「數量」，或是其發揮了多少經義裡的「深度」，而是其採取儒家恪遵訓詁、嚴謹求證的注經「態度」，對於佛經的註解傳統而言，是一大轉變，值得深入探究。

在丁福保注解的佛經之中，流通最廣的即是《六祖壇經箋註》，其影響也最大。根據統計，《六祖壇經》是中國讀書人最喜歡讀的一本佛教經典，以外文譯本而言，其數量排名第二（僅次於《般若心經》）。丁福保《六祖壇經箋註》則是《壇經》在中國最早、最完整之註本，《六祖壇經》的第一個英文譯本，是黃茂林居士（約 1886-1933）於民國 18 年譯出的，其所根據的底本，就是丁福保的箋註本（林光明，2004）。當代許多名僧、學者均極推崇本書，如星雲、淨空、惟覺、張澄基等，一般佛教道場開講《壇經》時，也多是依據丁氏箋註本。

丁福保的佛經註釋工作，最值得注意的，不是其註經的「深度」，而在於其註經時審慎、周密的「態度」。首先，丁氏自述其箋註佛經之動機云：

余獨怪《壇經》為宗門切要之書，自唐以來千二百餘年間，未見有人為之註者，何也？豈視為淺近易曉、人人可以盡解耶？抑道在心悟，不在文字，我宗門下客，不必求知求解耶？夫以指指月，指本非月；非馬喻馬，馬非非馬。指與非馬，猶之文字。借指可以見月，借非馬可以明馬。猶之借文字可以通經義，通經義可以明心見性。故文字為傳道之器，得道則其器可投。文字如渡海之筏，到岸則其筏可捨。若未到岸、未得道之時，文字究不可以不求甚解，此《壇經》之所以不可無箋註也。（丁福保，無年代）

丁氏指出過去沒有人替《壇經》做過注解，可能是因為禪宗本來就是主張「以心印心，不立文字」，不重視經論。²⁵ 然而文字對於悟道，仍然有其助力，不能全然拋棄，所以發心為《壇經》作注。其次，丁氏曾回顧其研究《壇經》的心得，顯現出會通儒、釋、道三教的態度，《六祖壇經箋註》「序」云：

²⁵ 關於中國禪宗是否真的「不立文字」，近現代學者已有不同看法，認為至少自宋代「文字禪」發達以後，公案、頌古、語錄等盛行，禪宗的修持反而是「不離文字」的（杜繼文、魏道儒，1995；周裕鍇，1998，1999；高雄義堅，1986）。

余於《壇經》研精覃思者既久，始知與孔子之〈十翼〉、子思之《中庸》、孟氏、莊氏之書，洒然多有會通之處。爰撮其大要而為學者告焉：

《壇經》所謂「佛性、實性、真如、自本心、自本性、明心見性、禪定解脫、般若三昧、菩提涅槃、解脫知見、諸佛之本源、不思善、不思惡、即自己本來面目」，皆「自性」之異名也。又謂「自性本不生滅、本無去來、本來清淨、本自具足、本不動搖、如如不動、第一義不動、無有一法可得」，皆言「自性之體」也。即〈象傳〉所云：「艮其止，止其所也。」即〈繫辭〉所云：「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也。」即「洗心退藏於密也。」即「天下何思何慮也。」即《中庸》所云：「天命之謂性也。」即「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也」。即孟子之「萬物之皆備於我也。」（即釋氏之「自性本自具足」）即莊子所述孔、顏授受之「心齋」也。即「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也。」即莊子所述之「游心於物之初，及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也。」論自性之體，三教之相同者如此。

《壇經》又謂「自性真空，能生萬法也。真如有性，所以起念也。用即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也。」引《維詰經》之「能善分別諸法相」也，引《金剛經》之「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也，皆言自性之用也。即〈象傳〉所云：「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也。」即〈繫辭〉所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即《中庸》所云：「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即孔子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也。即「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也。即莊子所云：「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也。亦即「庖丁游刃解牛」及「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也。《壇經》又謂「眾生是佛、佛性本無差別、但用此心直了成佛、離心無別佛、所以自性自度、自識自見、自淨自定、自悟自解、自修自行、自開心中之佛知見、不假外求、歸依自性天真佛、一悟即見心地上覺性如來」。此即孟子「性善」之說，及「人皆可以為堯舜」也，亦言性之用也。論自性之用，三教之相同者又如此。（丁福保，無年代）

此處丁氏從「自性之體」與「自性之用」兩方面，論述《壇經》所提倡的「自性、自心」與儒家的「天命之謂性」、道家的「心齋」等等概念是相同意義。雖然並未進一

步闡明發揮，但這種觀點無疑還是延續了宋代以下逐漸形成以「三教合流」為主的經典詮釋思想。²⁶

丁氏在佛經注釋方面最重要的貢獻，是自覺的採用一種與傳統佛教不同的注經方式與理念，開創新的風氣。在《佛學大辭典》「自序一」裡，丁氏云：

嘗謂儒家註經之學，漢儒尚矣！晉唐以還，漸滋鑿空。迄乎宋人，專尚義理，敝屣考據。元、明諸儒，鹵莽滅裂，強附解人者居多。昧闕如之義，啟師心之習。嚮壁虛造之風，自此而愈扇。求其幾於河間獻王所謂「實事求是」者，則如鳳毛、如麟角，藐焉僅矣。陸務觀謂「著書易而註書難」者，良以此耳。……漢儒註經，皆守師說，不尚新奇、不自臆造、不為附會、不事剽竊；不望文生義、不增字解經、不妄詆古訓、不率改經文；無騎牆之見、無固執之談，此兩漢經學所以獨步千古也。註儒書當如此，註佛經亦何可不然？（丁福保編，1992）

強調註佛經也應採取漢儒註儒家經典的態度。《六祖壇經箋註》「後序」云：

漢儒註經，必引會數經，勘契密合，而後下筆。不第時代近古，多得遺聞而已。魏晉以降，儒者不遵師說，意主穿鑿附會，漢學於是浸廢矣。其後如杜征南（杜預，222-285）之註《左氏傳》、顏秘書（顏師古，581-645）之註兩《漢書》，雖瞻博絕世，猶有摘其舛駁者。徐無黨註《五代史》，寥寥數語，其於大義毫無補益勿論矣。惟裴松之之註《三國志》、劉孝標之註《世說新語》、酈道元之注《水經》，皆能補原書所不載。其辭又雅馴，頗見魏、晉風軌。李善之註《文選》，止引經史，不釋述作意義。東坡嘗稱之，而詆五臣註為荒陋。凡此皆可為箋註家之鑒戒者也。（丁福保，無年代）

這段話指出，除漢儒註經之外，魏、晉以後之四大「名註」（裴松之《三國志註》、劉孝標《世說新語註》、酈道元《水經註》、李善《文選註》），亦可為《壇經箋註》之取法對象。又云：

後世之註佛經者皆宜据事徵典，不妄加義。不可如王輔嗣（弼）之註《易》、郭子玄（象）之註《莊》，屏實驚華，唯在發揮一己之意。蓋佛氏之微言與

²⁶ 例如〈頓漸品〉：「去來自由，無滯無礙。」丁氏註云：「《莊子·大宗師》：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即會通佛、道之一例（丁福保，無年代）。

義，惟佛與佛能知其究竟，即二乘菩薩亦不可空談妙悟，妄為度量也。（丁福保，無年代）

丁氏對王弼、郭象二註之不滿，正與前引贊同四大名註的基本立場是一致的。而此處丁氏在學術理由之外，又增加了一個宗教理由：佛經之奧義，唯佛與佛能知其究竟，則凡夫俗子似亦只能在章句訓詁、典故出處等文字方面下工夫了。

由於丁氏主張註佛經也要如同註儒書一樣，以章句訓詁為主，因此在註解字句時，引證各種資料就非常重要，甚至是註經工作的全部。《壇經箋註》「後序」云：

余謂註佛經者，獨宜多檢書冊，以期多得考證。惟不可太涉泛濫，以失說經家謹嚴之體焉耳。若但為簡單之經註，宜仿廖瑩中世綵堂本《韓文》註（徐氏翻刻本名《東雅堂韓文》）。朱子諸《集傳》例及《離騷集註》例，悉削去諸家姓氏，彙輯群說，自為一書，然已不能免宋元人說經之窠臼矣。此余所以遠祖漢儒經註，近法《三國志》、《世說》、《文選》等註，而為《壇經》之箋註也。（丁福保，無年代）

在「箋經雜記」中亦有一例，可以說明廣引各種資料的重要，「箋經雜記」第7條云：

六祖之「碑銘」及〈壇經序〉中有最難箋註者三處：王摩詰所撰〈六祖碑銘〉中之「泉館」二字。余註曰：「泉館即淵館也。築館於重淵之下，猶言穴居也。唐人避高祖諱，故改淵為泉。」當時頗以未得確證為憾，後偶閱袁褰仿宋本六臣註《文選》中郭璞「江賦」：「淵客築室於岩底，鮫人構館於懸流。」原註曰：「淵客鮫人，皆水中居，故築室構舍於岩流之下。」此即泉館之出處也，他日當為補入註中。又法海「壇經略序」中之「此地乃生龍白象來脈，只可平天，不可平地」三句。又德異「壇經序」中之「未上」二字。此三處皆不易箋註，學者慎勿滑過。達摩或作達磨，惠能或作慧能，皆可通用。第七品中之「羊鹿牛車」，近時新刻本改為「羊鹿之車」，大謬！萬不可用！不知《法華經》中共分四車：曰羊車、鹿車、牛車、白牛車耶？此略舉之，其說詳載註中。（丁福保，無年代）

案，四車之喻，原見《妙法蓮華經》「譬喻品」，《六祖壇經》「機緣品第七」六祖引之以啟導僧法達，丁氏註云：「羊車喻聲聞，鹿車喻緣覺，牛車喻菩薩，白牛之車喻一佛乘。」又引《法華科註》云：「白即是諸色之本，而與本淨無漏相應。體具萬德，如膚之充；煩惱不染，如色之潔」（丁福保，無年代）。

至於丁氏所註各經，之所以均是採用「箋註」的名稱與形式，也與其主張倣效儒書之註有關。《六祖壇經箋註》「後序」云：

箋與註，本是不同。箋之云者，《說文》云：「表識書也。」謂書所未盡，待我而表識之也。康成《詩箋》，昔人謂所以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特稱之為箋。今《壇經》中之各偈，大抵用箋者為多，因非箋不能達其意也。註之云者，稽典故、考輿地、詳姓字、明訓詁、識鳥獸草木之名也。註法之中，又分三端：一曰「正註」，宜引本事以解之者也。今《壇經》中所註之寶林、衣法、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以上見第一品）、知解宗、顯宗記（第八品）、卓錫泉（第七品）、水晶鉢（第八品）、六祖舊居（第九品）、嗣法四十三人（第十品）等是其例也。一曰「互註」，宜沿波討源，博採眾說，以為佐證者也。今《壇經》中所註之此心成佛、生死事大、生死苦海、福何可救、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以上見第一品）、用即了了分明、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八萬四千智慧（第二品）、有把茆蓋頭（第八品）及他心通（第九品）等是其例也。一曰「訓詁」，解釋其音義，而無害其文者也。今《壇經》中所註之獼猴、偈頌、確蘿（以上見第一品）等字是其例也。司馬遷之言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此精思之謂也。班固之言曰：「篤學好古，實事求是」，此詳考之謂也。詳考始可言註，深思始可言箋。（丁福保，無年代）

丁氏指出，「箋」是補充經文中義理未充分表明的部分，帶有詮釋的性質；「註」則是針對典故、地名、人名、字詞意義等進行解釋，對於「箋」、「註」兩種體裁的區別與重要性做了深入的闡述。丁氏還特別說明了其箋註《壇經》時所採用的方法，《六祖壇經箋註》「序」云：

余之箋註是經也，折衷眾說、擇善而從，或別書於冊、或書於片紙、或飲行跳格、而書於本經字句之旁、及書眉之上，久之得數萬言。乃使人錄出，分疏於每句之下，仿王逸註《騷》、李善註《選》之例也。其音訓即於每字之下註之，俾學者易於成誦，仿朱晦庵《詩傳》例也。其註作雙行小字，則仿宋本《十三經註疏》之例也。（丁福保，無年代）

「箋經雜記」第9條又云：

註中偶有重複之處，因經中往往有極機警、極爽利之話頭，與極確實之理解，非仍引前註不能了然者，故又重複而用之。非若專門名辭，前已註過

者，則每用註見前、或詳見前註，可以了之。若理論則反不如徑將前註仍註一番，學者既省檢查之勞，又獲熟讀之益，故註者不避重復之誚也。（丁福保，無年代）

這說明丁氏在註經時，也不是一味只注意章句訓詁、名物制度，對於《壇經》的思想義理，也並未忽視。《六祖壇經箋註》「序」之末有云：

唯是能薄材譚，讀書未廣，豐干饒舌，未免卮言。然區區掇拾鉅釘，容亦有為初學所未知者，則余敢效宋人之獻曝。曝寧足貴？惟獻焉者之愚誠，有欲已而不能自己者耳。（丁福保，無年代）

《六祖壇經箋註》「後序」亦云：

余學殖荒落，何敢插齒牙於著作之林，而為此經之箋註？蓋欲於佛經箋解中自辟一徑而行，一以援古德之言，示人以不蹈空疏之弊；一以便利根初學，閱之頓悟如來上乘，而為假諸文字為其筌蹄也。（丁福保，無年代）

顯現出丁福保對完成此書於後世的貢獻，具有相當的自信心。事實證明，丁氏的自信是有一定道理的。

六、結論

總結丁福保一生整理古籍文獻的成就，可以分成目的、材料、方法三個方面的特色來觀察。

（一）以學術研究及實用為目的

丁福保從青年時期就開始立志藏書，與其他傳統藏書家較為不同的是：丁氏是以學術研究為目的而藏書，不是以宋、元古本或罕見稀覯為標準。其自云：

富人得古書，往往秘之篋笥，終年不獲一觀。或好自矜嗇，傲他氏以所不及。或羅列几案，招致貴客，欣賞其楮刻之精雅。與尊彝環壁、法書名畫之屬，同視為一種玩物而已。問以作者之宗旨及書中之所有，則瞠目結舌而不能對。嗚呼！於收藏家求真能讀書者，十百中不能得一二人也。

又云：「書之藏於室者，不如藏諸胸中遠甚。所以藏書不如讀書，讀書又不如蓄道德、能文章為可貴也」（丁福保編，2004）。可知其藏書、整理文獻都是出於讀書與研究

的要求。另一方面，他認為讀書、研究也不能只是純學術工作，也要能立德、救世、實用，這在其箋註佛經方面，表達的更為明顯。如《佛學叢書》「自序」云：

余又悲如來出世妙法，雖極盡精微，而眾生為業力所障，不肯深心切究。生不知來，死不知去，輪迴六道，無有了期。吾聞古之君子，見患難則相救也，聞善言則相告也。……於是欲流通經典，為煩惱海中設一慈航，普度含靈，截斷生死流，登彼涅槃岸，以躋之於清泰之域。惟經文奧衍，非註不能明也。而古注尤為難讀，非初學所能會悟。惟有捨棄一切，編纂初學入門之書，及佛學辭典，與別為淺近之箋註焉而已。所謂淺近之箋註者，須字字考其來歷，句句求其證據。既不敢空談混漾，游衍而無歸；又不敢顯分宗派，出奴而入主。乃用漢儒註經之例，以為模範焉。(蔡運辰編，1970)

(二) 研究範疇要廣，蒐集材料要全

當代史學大師張舜徽先生（1911-1992）主張治學要走「博通」之路，可以從丁福保身上得到驗證。丁福保晚年，曾回顧其一生學術事業，撰《疇隱居士學術史》一書（丁福保，2004b），將其學術活動分為國學、醫學、古泉學、道教、佛教、小學、衛生學等，涉及自然科學、語文學、文獻學、宗教學等現代學術領域，可見其學問之淵博，是以後人曾譽其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丁福保譯，2007）。由其傳世著作來看，丁福保確實當得起這樣的稱譽。

而丁福保做學術研究與眾不同的一大特點，就是先要完整的蒐集材料，再以此材料編為總集為基礎，從事專書或專題的注釋、研究。其研究古文字學，就先編成《說文解字詁林》正續、編；研究古泉學，則編成《古錢大辭典》；研究佛學，則編成《佛學大辭典》；研究醫學，則編成《四部總錄醫藥編》；研究數學，則編成《算學書目提要》；研究文學，就編成《續歷代詩話》、《清詩話》等。凡此，都給後世學人很大的啟示：研究學問，一定離不開紮實的文獻學基礎！

（三）編纂材料集成，樹立後人典範

丁氏古籍文獻整理的成果，因多具創意發揮之意義，往往形成後世的學術典範，如以《說文解字詁林》為例，後來的學者，繼承延續此一體例的頗不乏人，如《爾雅詁林》（朱祖延主編，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廣雅詁林》（徐復主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甲骨文字詁林》（于省吾主編，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金文詁林》（周法高主編，香港中文大學，1975年）、《古文字詁林》（李圃主編，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2005年）、《虛詞詁林》（謝紀鋒主編，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等，不但有繼承，也有開拓。又如《佛學大辭典》，影響佛教界極大，至今引用者甚多，也興起倣效、編纂辭典之風，如《法相辭典》（朱芾煌居士編）、《簡明佛學辭典》（高觀國編）、《佛學常見辭彙》（陳義孝居士編）、《佛光大辭典》（佛光出版社編）、《俗語佛源》（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編）、《中國佛教百科全書》（臺南妙心寺主編）等。

附記：本文改寫自拙作「丁福保之藏書及其古籍整理之成就」，刊登於《鑑藏：兩岸古籍整理與維護研討會論文集》（2015年8月），243-262頁。

參考文獻

（傳統文獻）

清·永瑤等編（2001）。*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89，景印清武英殿本）。臺北市：商務印書館。

（近代文獻）

丁福保（1968）。*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景印民國5年上海醫學書局校刊本）。臺北：藝文印書館。

丁福保（1993）。*古錢大辭典*（景印民國27年上海詁林精舍刊本）。臺北：世界書局。

丁福保（2004a）。疇隱居士自訂年譜（民國18年詁林精舍鉛印本）。在*清代民國藏書家年譜*（第6冊）。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丁福保（2004b）。疇隱居士學術史（1949年上海詁林精舍出版鉛印本）。在*清代民國藏書家年譜*（第6冊）。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丁福保（2007）。*詩繪*（影印民國17年上海醫學書局鉛印本）。臺北市：學海書局。

- 丁福保(無年代)。六祖壇經箋註(民國上海醫學書局排印本)。
- 丁福保編(1992)。佛學大辭典(景印民國十年刊本)。臺北市：佛教書局。
- 丁福保譯(2007)。西洋醫學史。北京市：東方出版社。
- 余尚儒(2010)。加答兒一消失的醫學用語。臺灣醫界，53(4)，210-211。
- 杜繼文、魏道儒(1995)。中國禪宗通史。上海市：江蘇古籍出版社。
- 周振甫(1984)。文心雕龍注釋。臺北市：里仁書局。
- 周裕鍇(1998)。文字禪與宋代詩學。北京市：高等教育出版社。
- 周裕鍇(1999)。禪宗語言。杭州市：浙江人民出版社。
- 林光明(2004)。六祖壇經及其英譯。臺北市：嘉豐出版社。
- 武平英(2010)。蘇李詩真偽研究綜述與辨析。學理論，29，185-186。
- 高雄義堅(1986)。宋代佛教史研究。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第47冊)。臺北市：華宇出版社。
- 張進(2013)。丁福保近代出版事業評述。出版發行研究，5，99。
- 曹旭(1996)。詩品集注。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
- 章培衡、劉駿(1998)。關於李陵〈與蘇武詩〉與〈答蘇武書〉之真偽問題。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71-73。
- 陳祚明評選，李金松點校(2008)。采菽堂古詩選。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
- 遼欽立(1988)。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臺北市：木鐸出版社。
- 馮舒(1984)。詩紀匡謬。在叢書集選(第29冊)。臺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
- 楊家駱主編(1983)。說文解字詁林正補合編(第1冊，頁1-9)。臺北市：鼎文書局1983年。
- 蔡運辰編(1970)。丁氏佛學叢書。首編。臺北市：北海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 戴志強(2009)。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錢幣學界的領軍人物—丁福保。中國錢幣，3，72-75。
- 薩爾吉(2001)。佛教入門的金剛寶鑽，佛學研究的無言良師—評丁福保編纂《佛學大辭典》。普門學報，3，359-362。
- 譚暢(2011)。復旦大學圖書館館藏「丁氏文庫」藏書特色述略。上海高校圖書情報工作，1，59-62。
- 蘇精(2009)。近代藏書三十家。北京市：中華書局。
- 釋印光(1994)。印光大師文鈔三編。臺北市：佛陀教育基金會。
- 釋真達等撰(1994)。中興淨宗印光大師行業記。在印光大師文鈔選讀。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